

央视大火 为何刑不上“正职”

央视大火还少几个被告 云南信息报 2月25日 作者 五岳散人

云南信息报一评

央视大火案23名被告人中,7人来自央视,另有6名被告人来自施工单位中建公司、北京城建集团。他们接央视新址办通知后,安排了燃放活动当晚的消防、保安工作。其中,中建公司人员还提供了架子管协助安装燃放架,并安排烟花进场。

(北京晚报 2月22日)

这次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当中,固然有因为职务关系而倒霉的,也有一些因为某些原因加入其中而倒霉的。比如说唐智勇先生,他是将烟花由浏阳运至河北的浏阳三和物流公司法人代表,他手下的一名押运员也同时被诉;刘桂兰女士是提供烟花转运仓库的河北永清县供销社鞭炮日杂经销处经理;宋哲元先生等3名无业人员最终将烟花运进央视工地。

按照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法律专家的说法,这种起诉是有道理的。这位法律专家有言,涉及到危险物品肇事的时候,除直接使用人承担责任之外,其他运输等人员也会被同时起诉。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今还没起诉河北省批准生产这烟花的部门,要是没有他们批准的话,相信央视也可能逃过这么一次大劫。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奇景:央视大火被起诉的人物当中,说到职位都带个“副”字,不是副处长

就是副主任,正职的没有一个因为失察之责而被起诉的。比之连押运员、临时找来的搬运工都起诉的严苛,两者之间如果作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不禁要问,何以向下追查能到无底洞,而向上追查则到天花板呢?

其中的玄机说破不值一钱,其实不过是表示重视而已。央视这场大火不但烧得通国皆知,而且有些国际影响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不表现出特殊的重视,自然也是交待不过去的。如果只是一个人或者几个负主要责任的人站在被告席上,说不定舆论还是会穷追不舍。但如果被告席上洋洋大观站一排人,至少场面上是很能交待的。再把各路有关人等尽量一网打尽的话,当然更是昭示天下以严整与威武了。

如您所知,我们这里只要是重视的事情,要是不重视到荒诞的程度就不会算完,此事到了这一步田地,当然也是遵循着这个规律而行。甚至要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这种向下追查的深度,正好掩饰了向上追查的高度。谁说荒唐不是一种保护呢?

所以,无论是那个看上去就很不靠谱的损失数字,还是这种刑不上副处级,都是金蝉脱壳的手段,一边喊着重视,一边压制着真正应该做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化骨绵掌捎带击在了小人物的身上,连人物都算不上的同时遭到了池鱼之殃。面对这样一种状态,普通人只能是徒呼奈何了,我们只能提醒自己,以后就连打火机都不能卖给央视。

现代快报再评

本文作者独具慧眼,发现了此案处理结果中的“重大疑点”。但是细想也是老问题了,刑不上正职也罢,刑不上副处级也罢,都是有所回护;同时,一个案件成了众所瞩目的“要案”,对某些人的处罚往往超常得严厉,既是对舆论以示严惩不贷的决心,也是杀一儆百,但其效果却从来都不乐观。什么叫法治?我想,对中国当下来说,最基本的两条,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程序正义不可忽视,以保护人权。我们做得怎么样,不妨将此案也对照审视一番。

23岁副局长 凭啥加盟“火箭队”

近日有网友爆料,山东省新泰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记者通过当地政府网站发现消息属实。其中,23岁的女副局长两次面试成绩远高于笔试,对于其能力以及选拔过程,网友均提出了质疑。

(重庆商报 2月21日)

不怕官年轻就怕有背景 中国青年报 2月23日 作者 沂蒙客

中国青年报一评

在我国,一个人能否升迁,不少地方凭借的往往要么是论资排辈、讲求资历,要么有深厚的关系背景。这种观念植根于一些国民骨子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在现实中,这也是诸多官员升迁的基本路径。从科员,到副科长、科长,再到副处长、处长……以此类推,升迁的级别和过程不能逾越。至于谁升迁,凭什么升迁,是凭本事升迁,还是凭借关系背景升迁,抑或是花钱买升迁,那似乎是官场内部或是个别官员操纵把持的事务,与公众无关。所以,面对陌生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就容易妄加揣测了。

一个刚毕业两三年、年仅23岁的办事员缘何连跳三级升为副局长?一个普通的助理审判员当法院副院长能胜任吗?对此,连新泰市委组织部官员都称“不好说”,那么,谁又能消除公众质疑呢!

在当下社会,提拔任用官员应该“不拘一格”,提拔干部,不怕他年轻,就怕他有社会关系,有家庭背景。新泰提拔7名副局长,其中6名“80后”是否属于有背景背景的“官二代”,最好的做法就是公开其家庭成员,公示其工作业绩。这既是检验新泰市这次提拔干部是否公平公正的试剂,也是消弭公众质疑的有效手段。

现代快报再评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与入学和招生、求职和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弊病一个大症结。如果总是“掌勺者多占大锅饭”,真的有“官二代”等现象不断发生,社会不满情绪积蓄太多,就会常有题材成为人们发泄的出口。

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有些组织和机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诚信度严重不足,公信力严重受损,所以,动辄被人们质疑;从行政管理技术上说,也可以说是透明度不够,叫人不能不起疑心;从政治运作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公众参与度严重不足,人们对少数人掌控公众的命运很不高兴。倘若政治过程是透明的,公众有广泛的参与权,倘若当官是责任与权利相称的,职务是受监督随时可能罢免的,选任官职不仅不怕年轻,也不会怕“有背景”。人们并不在乎他们的“背景”,而只在乎他们的德才与政纲政绩。

谁把老百姓“赶上”街头“等地震”

抓了造谣者能否告别等地震 河南商报 2月25日 作者 周东飞

河南商报一评

2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许多山西人离家,躲避在广场、公园等地,夜不归宿,甚至开车逃往外乡。据山西警方透露,目前暂认定在百度贴吧发布谣言信息帖的一太原人为最早散布谣言者,一名嫌疑人已被刑拘。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河南商报 2月24日)

此前媒体已经报道,若要追究“谣言”的源头,最终还是要回到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本身。山西省地震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地震谣言源于市民对地震应急演练的误解。政府部门在对地震应急措施进行检查和演练,这些信息本来应该是公开透明的,甚至还应当组织民众一同参与演练,从而消除民众对相关活动的误解或过敏,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防震意识和避险能力。现实情况却是,政府在演练,民众在误解,一堵看不见的墙挡在两者之间,再一次从反面验证了“有公开,无谣言”的逻辑。现在,不认真去反思不透明所导致的教训,反倒非要去抓一两个所谓“造谣者”,其间是何种逻辑呢?

从一定程度上说,谣言不可怕,可怕的反倒是民众在谣言面前免疫

力全无的状态。一则谣言能够蔓延全省让无数人慌乱出走,难道仅仅说明谣言的威力吗?1月份同样有谣言,当地职能部门于1月22日辟谣,结果两天后就发生了4.8级的运城地震。地震预报本来就是世界性难题,说清楚了,民众自然可以理解,但是官方却宣称震级太低无需预报,强辩之后公信力全无。当地地震传言再度袭来,要求民众保持理性,可这理性的来源又在哪里?何况,在一夜混乱之中,缺乏的恰恰是政府辟谣的声音。如果职能部门的公信力完备,提供专业信息的渠道畅通,那么即便有谣言也不至于造成民众“等地震”的奇观。

不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抓了造谣者又能如何?品尝过“等地震”折腾的民众所期待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交代和结局。

现代快报再评

应该承认关于地震的信息发

布,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按现在的科技水平,地震的确很难准确预报。有些迹象,报吧,怕是虚惊一场,一则损失了GDP,二则怕说“狼来了”却没来以后没人信。老百姓,人命关天,当然是“宁可信其有”。政府“怕多事”习惯于隐瞒,与老百姓的心理恰好相反。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样:地震没来,政府有权力惩治“造谣”者;如果真来了,老百姓却无权问责政府。

所以,从地震难以预报的角度看,官民要互相体谅,特别是官方要慎用公权力惩治恐慌中传播不确定信息的人。另一方面,对于官方应该做的管理工作失职,要严查严惩。比如,既是演习,为什么不公告群众?传言发生时,山西省地震局网站无法访问,其他政府机构也未立即运转工作,应不应该有官员承担责任?不能只吓唬老百姓。

用工荒拷问“中国制造”

用工荒的伪问题其实是真问题 燕赵都市报 2月24日 作者 李记

燕赵都市报一评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回暖,春节刚过,沿海地区与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缺工现象。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重大转折,已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今后会经常出现。

(中国广播网 2月23日)

要想在短期内解决绝非易事。比如,针对用工荒,一些急需用工、用工缺口大的企业,不得不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吸引农民工的“光顾”。但是,在用工荒缓解、用工“充裕”后,这些企业还能保证上涨的工资不再下降吗?同时,针对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生活环境、福利待遇的问题,那些尚未完成企业转型升级,并一直以来对《劳动合同法》“轻慢”的企业,会尽快完成自身的“升级换代”吗?此外,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关注工作生活环境、福利待遇问题,由于生活的环境和接触的社会更加多元化,其在个人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目前用工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当前阶段,我们一方面

应该看到用工荒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一些企业,逐步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重新认识并切实赋予农民工正当的权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仅靠企业和资方的“觉醒”和“自觉”,短暂性的用工荒倒逼效应毕竟太过微弱。如何透透用工荒的“伪问题”,使隐藏在假象、表象背后的“真问题”一并纳入公众关注的视线,并动用行之有效的措施迅速、全面解决,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智慧与决心。比如说,应该尽快促进并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逐步化解各方利益对薪酬体系改革的掣肘,尽快破解城乡户籍壁垒、尽快健全针对农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等等。

现代快报再评

国家有关部门已出面讲话了,

用工荒是伪问题,因为就业难仍然严峻。我看,不要争什么真问题伪问题了,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总之是有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

应该承认几个基本事实:一是农民不交皇粮国税后,工资太低他们出门打工的压力就大大减轻了,老板必须加薪才能招到人,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愿做苦力了;二是“中国制造”的老板大多做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低成本取胜,利润率本来就低,加薪多了他要破产或跑到劳工更便宜的外国去;三是政府和老板“搞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很多没有技术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不能适应。因此要解决的相应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职业技术训练。不管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混到了大学文凭的年轻人,都有不少人亟需政府和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这才是最大的真问题吧。

本版特约主持人 鄢烈山

资深报纸编辑,专栏作家。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的代表之一,主持多个评论专栏。